

“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的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

纳日碧力戈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是世间常态, 虽然根据盖尔纳的经典定义和分析, 民族主义要推动“一族一国”, 但诗性智慧让我们认识到民族生态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 和而不同是大道。

关键词: 多元一体; 和而不同; 民族主义; 诗性智慧; 民族生态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7)02-0012-06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7.02.002

民族主义发动的匀质化运动并非自古使然。古人感物心动, 形于声, 变方成音, 比音而乐。心感于形物是推动力, 形物流变, 心随之变, 差异特殊是基础; 同时, 心智要受大道统辖, 具有普遍性, 属于重叠共性。民族主义试图打破原有形物与心智的关系, 试图用心智统领一切, 随心所欲, 反倒造成物欲横流, 全然忘记心智与形物分属不同层面, 心智虽可以反思甚至操控形物, 但形物本身有“诗性”, 有个殊性, 作用于心智, 使之有弹性, 随机应变。“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属于人间共生常态, 反映个殊性的诗性智慧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民族生态的存在, 追求和而不同的大道。

一、多元一体和天下大同

2015年12月25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举办“2015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第五届复旦人类学日”

活动, 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金力教授为中国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颁发“人类学终身成就奖”。乔健先生致辞“有关人类学华文本土化的一些省思”, 其中提到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中国版图空前扩大, 民族杂居, 文化嵌入, 习俗交融。具体说来, 当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是五大文明板块, 即“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渔盐交商”, 这些板块上各有大小地方政权, 它们在碰撞、更迭和吸纳中逐渐形成一体^[1]。一方面, 五大文明板块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不同的性格取向和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 这些板块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 各个民族都兼而有之,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大都讲信修睦, 家国维系, 求同存异, 互补共生, 形成民族生态。

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看, 当代中国的多元一体格

收稿日期: 2016-08-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13AZD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 教育部长江学者, 贵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基地“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复旦大学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局属于文化多元、民族多元,属于形物层面;国土一体、政治一体、主权一体属于心智层面。虽然对多元一体的理解不尽一致,有交融论和自治论的争鸣,但他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存在众多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争鸣围绕两个层面进行:第一,如何对现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群体分类和命名;第二,如何在此基础上想象和设计未来中国的民族格局。

自 20 世纪 50-70 年代,我国确认了 55 个少数民族,在 80 年代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形式确定了他们的政治、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在名称上,各个共同体不分大小,不分“先进”“落后”,一律称“民族”,英文对译 Nationality。改革开放之后,原有英译“民族”受到质疑:Nationality 不是“国籍”吗?中国有 56 个“国籍”吗?于是国家民委率先用 Ethnic 取代 Nationality。但中央民族大学折中,将校名英译为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其实,现今中国这块土地上语言多样、文化庞杂,本是自古而然的现象,关键是看中国看小了还是看大了——现在的中国版图是“大中国”,不是“小中国”。“大中国”是各族共建的政治空间,是多族一体,不是一族一体。此外,中国近现代以来使用的“民族”一词,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是 56 个民族的“民族”,也可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不必和西语逐一对应,不必“硬译”成 Ethnic 或“族群”,更何况西语中的 Nation, State, Ethnicity, Race 等也并不那么容易说清楚。

在世界上,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常态,不是例外。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就连过去被认为是高度同质化的日本,也拥有少数民族。瑞士也是多民族共同体,由日耳曼人、瑞士籍法兰西人、瑞士籍意大利人和列托罗马人后裔组成,官方语言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印度的语言多达 2000 种,其中 55 种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学,其中 19 种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尽管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受到挑战,但迄今尚无可替代的理念和相关政策。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合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的“重叠共识”,即“包容差异,和合共生”,在此基础上达成重叠共识。“美美与共”是基础,“天下大同”是高端理念,本不属于同一个层面。

“天下大同”不是“同化”,不是“融和”,而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

二、盖尔纳的实证主义观点及其反拨

尽管“一族多国”和“一国多族”是历史,也是现实,但“一族一国”毕竟是民族主义鼓吹的,且有生命力。国民国家建设成为时代主流,工业经济和市场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昔日的村寨和旧有的传统。民族主义者“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2],让文化的边界和政治的边界重合起来,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民族主义的时代尚未结束。农业社会分高文化和低文化,武士、牧师、管理人员、自由民,“各司其职”,缺乏上下沟通,朝廷鼓励的是差异,而非认同^[2]。然而,工业社会出现后,频繁的社会流动成为必需,职业横向更替是“常态”,纵向的子承父业反倒是例外。现代教育打破了阶层之间的藩篱,有利于培养掌握技能的“标准”公民。劳动者经过培训,可以互换工种^[2]。工业社会的典型工作不再是播种收割,不再是对物的直接加工,而是对意图和概念的掌控,对复杂设备的操作^[2]。工业革命时代也是民族主义时代,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组织的结果^[2]。盖尔纳旗帜鲜明地反对四种民族主义理论:民族自然论——民族属于自然存在,不是社会建构,凯杜里的“思想偏差”论——民族主义本非工业社会所必需,它的出现是偶然的知识迷失;马克思的“错误投递”论——原本应该属于“阶级”的东西被错投到了“民族”那里;“黑色幽灵”论——民族主义是关于鲜血与领土的“返祖”暴力,热爱民族主义的人说它带来活力,仇恨它的人说它象征野蛮^[2]。

总之,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可称为“现代论”,即民族主义唯有在现代工业时代产生,是工业化的产物,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民族主义先于民族、民族国家出现,它或者对于萌芽的原初民族要素重新排列组合,“创造”民族,或者另起炉灶而创造。对于盖尔纳的现代论,许多学者在承认其深刻、犀利的同时,也进行了广泛的商榷。罗曼·施波尔卢克(Roman Szporluk)批评盖尔纳没有充分考虑英国的“旧国民族主义”(Old-state Nationalism)^[3],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说盖尔纳不能解释为

何民族主义出现在19世纪的中欧和20世纪的非洲。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对盖尔纳也持批评态度。

布伦丹·奥利里(Brendan O'Leary)为盖尔纳说话,认为阿姆斯特朗、史密斯和格林菲尔德等混淆概念,把用来建构民族主义的“材料”等同于民族主义本身。共同文化、共同宗教和共同地域的意识并非民族主义的本质。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属于同一个民族^①。盖尔纳强调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没有提到军事和政治的重要作用,因此受到诟病。批评者指出有的工业化不需要民族主义,有的民族主义要建设国家而不是建设工业化。迈克尔·曼和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欧洲国家发展军事技术、建立国家军队、强化税务和税收等,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摧毁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区主义^②。沃克·康纳认为研究者常常忽略感情因素对于“族群民族主义”的重要作用^③。

盖尔纳的“屋顶论”强调了物质力量,指出市场驱动的铁面无情,但他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们为了获取利益需要让步的另一面,其本质是将形物与心智割裂开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面对极端民族主义,会吸取历史教训,在理性考量的基础上进行商议,不会让心物割裂、天地不通。

同时,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两个方面的确凿事实。其一,民族主义者狂热地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常常得到敌视本国政府的另一国政府的帮助;而拥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心将自己的民族性强加给在领土范围内的其他民族,或者侵占宣称应属于他们的其他国家的土地,这两种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可怕的国内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若发生在核武器时代,很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其二,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还是新兴民族,只要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制度(应译为“习俗”——引者),他们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毁灭的,迫害他们,屠杀他们,不仅不能消灭他们的民族感情,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加强;不断地压制他们,只会造成他们像一座座一触即发的“火山”^④。

自从“屋顶之争”尤其是二战以来,由主权国家参与支持的杀戮剥夺了大量生命,数量“超过战争

和自然灾害所造成人口损失的两倍”^⑤,仅纳粹屠杀的人口就达到15,000,000人以上,可能达到20,946,000人^⑥。美国和南非都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但种族隔离行不通,许多国家又转向民族同化,如美国有“熔炉政策”,澳大利亚有“被偷走的一代”^⑦。自20世纪60年代,各国开始反思民族自决的负面影响,检讨建立单一制国家的代价,转而实行文化多元主义,例如加拿大推行法裔和英裔的“二元文化”政策,后来推行把其他民族包括进来的“多文化”政策。1971年特鲁多总理提出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同一时期,美国放弃了“大熔炉神话”,推崇文化多样性^⑧,黑人民权运动为此做出重大贡献。尼克松于20世纪70年代宣布,美国对印第安人实行自决政策,不再对他们实行强迫解散的“结束政策”。挪威政府曾经对萨米人实行挪威化政策,但奥拉夫国王于1989年向萨米人正式道歉^⑨。

三、回归诗性智慧

要认清“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的现实,就要回归到维柯式的诗性^⑩,脚踏大地,深入草根。这样就可以避免罔顾事实的一厢情愿,用主观意愿和片面想象代替复杂现实。维柯认为,古人有强大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他们的诗歌和玄学交融在一起,充满诗性智慧。诗性就是感性、具象和神性、抽象的融合。古人把神性知性与物感物觉混合在一起,不加区分,属于前逻辑主义的“无知”。不过,恰恰是这样的“无知”可以做镜子,用来观照当下地天隔绝的怪现象,反思“语言独霸”,纠正“概念垄断”。灵韵出自地天通,出自物感物觉与语言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语言不虚,物感升华。传统民族志的调查对象是诗性智慧人,他们把生活真正作为过程,不需要十年规划,不需要文本限定,不受现代语言之累。他们是大地之子,太阳之女,能够应对千变万化,也能够应对生死存亡。在他们的生活中,虚实相济,行思互动。

回溯语词的语源,直观物感物觉,有助于发掘“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的原初根据。英语 pen(笔)来自拉丁语 penna,原义“羽毛”,本指“鹅毛笔”,后来笔的质料变化,已经用了金属笔尖,但用字不变;英语 wall(墙)本义是“柳条编的东西”,可

以追溯到一种考古学上的“编砌式建筑”——“或者用柳条编的东西做底子,上面再涂上泥,或者把泥舂在两片柳条编的东西的中间”^[7]。汉字和钱币有关的字,如财、货、贡、赈、赠、贷、赊、贿、赂等,都有“贝”字,表明中国古代曾用贝壳作为交易媒介物^[7]。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具体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比较而言,民族(国民)国家是晚近产生的,它的边界一般不会遵守语言、文化、民族以及生存环境的边界。

杨希枚先生撰《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一文指出,先秦赐姓与汉唐赐姓不同:先秦赐姓是“赐民、分民或授民”,是把该姓的人群“赐予”他人,且“以异姓功臣为赐姓对象”;汉唐赐姓是“赐符号”,不涉及具体的人,授姓者“改从王室族名”^[8]。先秦赐姓制度反映诗性智慧,汉唐失去了它。赐姓制度从先秦的“实在”变为汉唐的“虚名”,是“绝地天通”。汉代壁画表达道德宣传、神仙信仰^[9]，“图像之设,以昭劝诫”^[10]。汉文帝未央宫承明殿的壁画中,包括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獬豸;东汉墓壁画中有虎形,用来趋吉避凶。此外,汉代壁画另有山神海灵,奇禽异兽,用来“威惧边夷”^[9]。以象似勾连象征,以物感直通精神,这是古人诗性智慧的真谛。后人不必追究它是否“科学”,但求其中深刻的寓意:万象共生,物物相连,不可偏废。

“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虽然是现实,是“格局”,但要理解它,要承认它,还需要诗性智慧的帮助,还要超越被现实漂白的“口语”^[10],回到口头文学的古典表达,回归物感物觉。例如,苗语口语中的“造船”一词是 tid miangx,但在古歌中却是 xix niangx,意为“凿船”,是制造独木舟,而不是后来的大船^[10]。黔东南苗语用三个词表示“说话”:vud(说)hseid/hveb(话)、hmat(说)hseid/hveb(话)、ghangd(说)hseid(话),在口传诗歌中还有:

- Bait hseid/hveb(使话语分权)
- Dus hseid/hveb(使话语爆裂)
- Buk hseid(打开话语)
- Bet hveb(使有语言声响)
- Dib vongb(使话语成条/列)
- Vux hveb(纠集声音)
- Buk lot(开口)
- Hefenb hveb(把声音分开)^[10]

这些“话语”充满物感物觉,形象生动,没有临场是不可能把握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音位区分意义,音素不区分意义。但是,在诗性智慧中,音素也区分诗性意义,即区分象似意义。例如在苗族口传诗歌中,hxub、qad、diel、khat都表示“亲戚/客人”,但出于格律需要,或者出于词汇固定搭配的需要,“hxub多出现在押b调的位置,qad多出现在押d调的位置,diel多出现在押l调的句尾,而khat则多出现在押t调的位置”^[10]。在“标准语言学”中,包括体态语在内的准语言(副语言)属于有声语言之外的“补充手段”,但它在实际交际中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汉语里的“红光满面”“交头接耳”“察言观色”;傣语的“吐痰要看准地板缝,坐客厅要注意盘腿”“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哈尼语的“夸你长不要笑,说你短不要跳”“家庭团圆,笑声送饭入口”;瑶语的“昂头翘首问人话,爹娘听了也不答”^[11]。这些生动具象的表情、手势和体态,起到一般语言起不到的作用,接地气,连草根。云南卡场社区景颇族的乌帕寨坐落在海拔1400米的山上,乌帕人根据地势由低到高将旱地划分为“格田夏”(坝子边比较肥沃的地)、“格西格田”(温暖的地)、“依松夏”(冷地);基诺族把土地划分为“折肖”“折交”“迭它”。“折”是“轮”的意思,13年一轮;“肖”是“地”的意思,“折肖”就是“轮作的土地”;“交”为“中间”的意思,“折交”指“介于‘折肖’和‘迭它’之间的土地”;“迭它”的“迭”为“朝”的意思,“它”指“上”的意思,“迭它”就是“高出的土地”的意思^[11]。这是本地人群的认知基础,是他们做人的“文化图式”,是他们的关键符号的源泉,也是他们培养价值观和爱国观的“基本模式”。诗性智慧是打开和而不同之锁的一把钥匙。

四、民族生态论

网络世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一方面它要求人们服从标准,遵守同一,崇尚普世,万维相连;另一方面它张扬个性,鼓励差异,推动创新。这里面有地天通的关系:天同地异,天是大道,地是个殊,上下沟通,生命不息。无论国内国外,民族差异,互补共生,相得益彰,形成生态。随着信息流通和国际旅行的频繁便利,人们见怪不怪,多数人已经能够

默认民族差异,能够加以欣赏,加以尊重。佛教有“微尘数”,道教讲道法自然,甚至遥远的美拉尼西亚也有“颗粒”观——人不是分类的终点,不是最小单位。万物分类的最小单位是“微尘”,是“颗粒”,分类的对象是包容万象的自然。在这些地天通的宇宙观中,人是万物万象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由“微尘”和“颗粒”构成,与万物平等,与万象共生。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阐发佛教思想,提出共生论想,努力向各个领域扩展。共生是创造性的关系,能够面对矛盾,包容对立,指向理解和肯定,开辟共通领域,“共生是在给予、被给予这一生命系统中存在着的”属于互相尊重的圣域^[12]。

人与自然的共生、艺术与科学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传统与尖端技术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不同年代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海洋与森林的共生、抽象与象征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肉体与精神的共生、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开发与保护的共生、不同层次内容的共生^[12]。

基于“微尘”观或“颗粒”观的万物生态已经包括了民族生态,它是各民族互相依存、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民族生态观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差异恐惧症”。少数民族成员可以是一位丈夫、一位母亲、一位工程师、一位政府官员,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做中国人,也不影响他们做亚洲人或世界人。多重身份对应多重环境,也对应多个“面对”:我面对妻子是丈夫,面对女儿是父亲,在职称评定的时候是工程师。

清代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辛亥革命后的中央政府加以继承,政体变而领土格局基本不变,大陆的国家建设也经历了从“五族共和”到“56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尽管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新中国民族政策仍然需要完善,但我们必须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最好的。中国存在多种语言和多样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自古如此,诸多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有自己特有的认知体系、价值观和宇宙观,他们需要得到承认,新中国确认 55 个少数民族,照顾了历史,关照了当下,体现了高水平的政治艺术。各民族精英求同存异,在政治上达成共识,共同组成中国这个大家庭。

民族是一个古老现象,但工业革命赋予它新生,以至于它被说成是“想象的共同体”。起初,新生的

“民族”与“民族国家”大获全胜,当下联合国的 192 个成员国绝大多数出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而且绝大多数属于多民族国家。根据一般的说法,当今世界有 2000-7000 个民族,而民族国家不过 200 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可谓少之又少^[13]。“一族一国”的大规模民族自决运动已经成为过去,各主要国家的民族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多元,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选择是民族自治。“一国多族”和“一族多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它呼唤理论创新,呼唤对“一族一国”论和旧有同化模式的超越。

注释:

- ①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 ②郝时远:《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理论与实践误区》,《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 ③“中华民族”称The Chinese Nation。
- ④国家民委原英文译名为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现英译名为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 ⑤过去是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or Nationalities。
- ⑥休·希顿-沃森认为区分“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s)很重要,国家可以由多个民族组成,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于不同的国家中。参见[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G24Qngp7rWXfwDCNYGmSXuSWq3kuK59B1j0xg4iCsZWLK_xbFBFhpx04_XFK7OlkGUEGVxt-odXYegosYQ9wK#5,2016年1月10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74/19099114.htm#12>,2016年1月10日。
 盖尔纳对此回应说,一些民族主义由工业化直接产生,另一些则受工业化影响而间接地后发产生。参见Szporluk, Roman:Thoughts about change: Ernest Gellner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Hall, John A.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pp.27,2008。
 阿姆斯特朗著《民族先于民族主义》(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1982),探讨1789年以前欧洲和地中海伊斯兰社会的民族主义,指出民族具有宗教和世俗两种根源。史密斯著《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强调,族群文化和社会组织广泛存在于古代

的欧洲和亚洲,格外突出,而王国也常常建立在族群共同体之上;民族主义代表了原有政治规范和社会规范的转型和推广。里亚·格林菲尔德著《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把16世纪的英国看作民族主义的发源地。

⑪ O'Leary, Brendan: Ernest Gellner's diagnos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overview, or,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s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 Hall, John A.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5, 1998. 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和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从卢梭、赫德尔、费希特、科劳伊斯(Korais)和马志尼开始,自治(autonomy)、团结(unity)、认同(identity)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者追求的三大奋斗目标(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 Introduction:5)。

⑫⑬⑭⑮⑯李红杰:《由自决到自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38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将大量土著儿童迁移到白人家庭,让他们同化于白人。

⑰维柯在《新科学》中使用的方法论是“回到原点”,强调出生、成长、本性的内在一致性。人类文化的起源要追溯到诗性,希腊语“诗”的本义是“创造”或“制作”。在诗性智慧的推动下,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有了“粗糙的起源”,催生了“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从这种粗浅的玄学中一方面发展出也全是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的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参见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⑱《后汉书·酷吏传》“阳球”条。

Factu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 Breakthroughs: Models of One-State-Multiple-and-Ethnonationalities and One-Ethnonationality-and-Many-States

Naran Bilik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 It is natural for us to have the Models of One-State-and-Multiple-Ethnonationalities and One-Ethnonationality-and-Many-States coexisting. Though nationalism tries to promote the model of one-nation-and-one-state according to the Gellner's classical definition and analyses, poetic wisdom makes us recognize the factual ecology of ethnonationalities and its sustainability. Harmony with Diversity is the Way.

Key Words : Unity and Plurality; Harmony with Diversity; Nationalism; Poetic Wisdom; Ecology of Ethnonationalities

[责任编辑:周普元]

参考文献:

[1]于逢春.“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视野下的西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1).

[2][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Hall, John A. ed., 1998, Introduction: 4.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Mouzelis, Nicos: 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 some definition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Hall, John A. ed., 2002,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pp. 158.

[5]Connor, Walker,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M].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7]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C].1955.

[9]邢义田.画为心声:图像石、画像与壁画[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李炳泽.口传诗歌中的非口语问题——苗族古歌中的语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1]骆小所.文化与语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12][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M].覃力,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8.

本期特色栏目作者

AUTHORS FOR SPECIAL ISSUES



纳日碧力戈，全国人类学民族学首位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基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原美国卡尔顿学院珍妮-拉斐尔·伯恩斯坦人类学讲座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6部。

(文章内容详见第12-17页)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和辽宁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加坡连瀛洲纪念奖学金得主。现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文章内容详见第18-24页)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双聘教授。出版著作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全球化。

(文章内容详见第42-51页)

杨立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出版专著3部、合著3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央部委科研项目30余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69-76页)

丁建定，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发展历史、基本理论和制度建设研究。出版著作、教材近20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数十项，获第三、六、七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奖。

(文章内容详见第77-83页)

汪宁，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教育部等项目多项，发表论文30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105-115页)

